

# 论传教士中文报刊对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催生作用

赵晓兰

中国近代报刊是个舶来品，从报刊内容、形态到社会功能，都是传教士最先引入中国的。19 世纪上半叶至 20 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用中国的语言文字，成功地创办了大量的报刊，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化的报刊模式。尤其是一些开风气之先从而为后世提供许多范式和样本的传教士中文报刊，诸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以及传教士倾注心血经营、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报刊，诸如《万国公报》，它们为中国民族报刊从业者提供了成熟而又便于借鉴的蓝本。西方的新闻采编、编辑业务、管理方法、技术手段以及发行、广告、印刷等整个流程，随着传教士在中国大规模的办报活动而被传入中国，从而为中国人自办近代化报刊提供了参照，中国近代民族报刊从形式到内容，都从传教士中文报刊中汲取了养分。正是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垂范，催生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成了促进中国民族报刊产生的不自觉的工具。

## 一、传教士中文报刊的舆论引导功能，对中国近代民族报刊实践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传教士中文报刊所具有的传播功能，使它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变法运动的推手之一，以《万国公报》为例，1868 年，《万国公报》前身《中国教会新报》创刊于上海，1874 年更名为《万国公报》，该报后来成为广学会机关报。在《万国公报》存在的几十年时间里，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时期，中国经历了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配合这些事件的发生、发展，《万国公报》刊登了大量文章，尤其是它的时评文章，评论时政、鼓动改革，详细提出改革计划，发出了“不变法不能救中国”的呼声，使之成为“影响中国领导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sup>①</sup>。对中国改革思想的形成与改革运动的兴起、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它同时对中国知识分子中要求变革的有识之士影响很大，例如孙中山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上李傅相书》，就以“广东香山来稿”的名义，发表在 1894 年第 69 册、70 册的《万国公报》上，《上李傅相书》即上李鸿章书，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就国事发表意见，文中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民、变法维新的主张。我国维新派也深受《万国公报》影响，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即仿其名，取名《万国公报》。这种影响甚至包括光绪皇帝，“在一八九八年，前清光绪皇帝为欲改革政治，曾向广学会定购书籍多种”<sup>②</sup>。光绪皇帝保存有全套的《万国公报》与广学会出版的 89 种书籍。

正是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垂范，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启示，他们发现了一条指陈时政的极好途径，认识到了报刊作为舆论宣传的重大作用。“西方报馆主笔……能自由剖陈国是，含寓褒贬，对中国士人而言，乃为一极感惊喜之事。有清一代，政略以防弊为主，文字之祸，诽谤之禁，穷古所未有，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久受抑制，今忽见西土之作为，暗示之下，乃产生一种跃然以动及锋而试心理。故丙申维新志士创报于沪上，亦攘臂呼号，抨击时政矣。”<sup>③</sup>“此后梁启超、汪康年辈办报于沪上，启迪民智，开通风气，促成社会与政治之变革，其间波澜一层层撼动。”<sup>④</sup>他们正是看到了传教士中文报刊对于中国社会的舆论引导作用，才萌生出自己办报，以报刊“立言”来改变中国社会的想法，因为，“以言论政，这在报刊出现以后成为了可能”<sup>⑤</sup>。传教士中文报刊的示范对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① 《同文书会年报 1891》，转引自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42 页。

② 季理斐夫人著，叶柏华译述《广学会为中国妇女及儿童做了些什么工作？》，载《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短讯》第四期，上海广学会出版，1937 年 4 月，第 10 页。

③ 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 84 页。

④ 同上，第 92 页。

⑤ 王创业《中美新闻客观性的进与退——一种基于历史维度的思考》，《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 年第 6 期。

## 二、传教士中文报刊引进了西方近代化的报刊样式，为中国近代民族报刊提供了模板

1815年创刊于马六甲的中国近代第一份传教士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尽管处于探索期，但在编辑思想与编辑特色方面为中国人自办报刊留下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方面：第一，文章大多篇幅短小、语言精炼，主编米怜对《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读者进行过分析，认为该刊的读者主要是下层劳动者，他们文化水平低，闲暇时间少，又穷又忙的人没那么多时间阅读长文章；第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使用标点符号进行断句，方便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阅读，“”“。”“——”等标点都出现在文章当中，距五四时期新式标点符号的推广早了一百年。

1833年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在许多方面为后来的中国近代民族报刊提供了先例。从期刊编辑角度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分类编纂方式，例如每期卷首设有目录，设立基本稳定的栏目，并设有各篇标题的做法，为后来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分类编纂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还为某些文章加上编者按语，针对文中一些问题发表评论、提供观点。在写作风格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强调通俗、简短和可读，它的题材多样，内容贴近生活，尽量吸引读者注意力，它运用对话、讲故事等深入浅出的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与理念，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些都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首次采用而为后来近代报刊普遍运用的，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鸦片战争后创刊的传教士中文报刊，继续为中国近代民族报刊提供模板。例如，1853年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每期都设有“近日杂报”的新闻栏；它刊登读者来稿，例如《赌博为害本港自当严禁论》，这可能是中国报刊史上最早的“读者之声”；它还设置“杂说编”、“喻言一则”栏目。1857年创刊于上海的《六合丛谈》，设有“新出书籍”栏目，每期介绍几本新书；它还刊登当月的天文历，其依据是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大英航海历书》。这些都是后来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经常采用的样式。在内容上，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突破了中国古代邸报的模式，不再围绕皇帝、官吏和封建政府的活动而展开，其纪事无所限制，“传述各国国家之事，上自朝廷，下及闾里，一行一言，一器一物，无论美恶精粗，备书于纸”，“故每遇事，可以尽情议论，直陈无隐”。<sup>①</sup>具体言之，传教士中文报刊在内容上最大的特点是，它主要由新闻、广告、言论、副刊四大部分组成，而这是与古代邸报截然不同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将崭新的西方近代报刊模式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初期形态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 三、传教士中文报刊刊登广告的行为，为中国近代民族报刊提供了近代化的经营理念

传教士中文报刊经营理念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报刊中刊登广告。中国古代“邸报”从来不登广告，广告也是由传教士中文报刊最先引入中国的。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十分重视商业信息，它对广州市场价格进行详细调查后，分“出口的货”和“入口的货”两类，在“市价篇”上公布，提供了一百多种进出口货物的详细价格，为中国人尤其是商人提供了大量的贸易信息和价格行情。《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第一个发布市价行情的中文报刊，它所刊登的市价行情，是我国近代报刊广告的萌芽。《遐迩贯珍》则开中文报刊刊登广告之先河。从1855年起，《遐迩贯珍》以附刊形式增出“布告编”，即广告栏，随报发行，页数另起，一般每期4页，也有3页的，用于刊登船期、商情材料与广告。“布告编”开设前一期登载的《遐迩贯珍小记》，对为何刊登广告、如何刊登作了说明“西方之国，徇卖招贴，商客及货丝等，皆藉此而白其货物于众，是以尽沾其益。苟中华能效此法，其获益必矣。凡印招贴者，初次每五十字要银半员，再印者则半其初价，若五十以上，每字加一先士。”<sup>②</sup>“布告编”开设第一期刊登的《论〈遐迩贯珍〉表白事款编》，对广告作用再次作了宣传“遐迩贯珍一书，每月以印三千本为额。其书皆在本港、省城、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处遍售，间亦有深入内土，官民皆得披览。若行商租船者等，得藉此书，以表白事款，较之遍贴街帖，传闻更远，则获益良多。今于本月起，遐迩贯珍各号，将有数帙附之卷尾，以载招贴”。<sup>③</sup>“布告编”开设第一期，即刊登了8则广告，其中商船广告4则，商行广告2则，英华书院广告2则。“布告编”末尾还登有“洋货时价”与“本地货时价”。《遐迩贯珍》是第一家刊登广告的中文报刊，之后，广告便经常出现在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中。例如，《中国教会新报》宣布“可录出外国教会中事，仍可讲论各种学问，即生意买卖，诸色正经事情”，<sup>④</sup>创刊后第二期即刊登洋行广告。这样，作为近代报刊重要内容之一的广告，随着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创办而被引入中国。

① 转引自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92-393页。

② 《遐迩贯珍小记》，《遐迩贯珍》，1854年，第12期。

③ 《论〈遐迩贯珍〉表白事款编》，《遐迩贯珍》，1855年，第1期。

④ 《教会新报》合订本第一册，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1968年版，第8页。

广告的出现,象征着中国报纸脱离了古代邸报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模式,导入以广告收入开展近代化经营的理念,而将这种理念引入中国的,正是传教士中文报刊。传教士中文报刊的首开风气,为中国近代民族报刊提供了借鉴。

#### 四、传教士聘用中国文人当助手,为中国近代民族报刊培育了第一代人才

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创办者大都曾经受雇于传教士报馆或其他出版机构,正是通过参与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工作,使他们掌握了办报的基本知识,无形中为中国培育了第一代新闻、出版人才。中国知识分子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参与传教士中文报刊工作并获得办报经验:

##### 第一,参与传教士报馆工作

在创办中文报刊的过程中,传教士往往雇用中国人参与刻制、排版、审稿、校对、印刷、发行等每一道工序。例如,我国近代报刊先驱王韬,与传教士接触共事长达二十多年。1849年,王韬开始在传教士出版机构上海墨海书馆协助传教士译书、校定,期间接触了《遐迩贯珍》等传教士中文报刊,并参加《六合丛谈》的编撰工作,许多传教士的文章都经过他的润色加工,他被传教士林乐知誉为“中国最有才干的人之一”。正是这二十多年的熏陶与影响,成就了他著名报人的角色。黄亚胜“实际上承担了《遐迩贯珍》的报道、英文翻译、印刷业务。例如,根据1855年第1号开始的广告‘布告编’,我们知道,黄亚胜具体负责广告业务的招揽。”<sup>①</sup>还有一些从事印刷、排版工作的人,他们同样在传教士报馆中得到了锻炼,例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国人梁发就在其中承担了刻印和发行工作,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报童的祖师”<sup>②</sup>。正是在传教士报馆中,一部分中国人掌握了西方近代报刊的出版、经营理念与先进技术。

##### 第二,担任传教士中文报刊的中文主笔

“一般说来,对于那些出自传教士们的著作,口译之后似乎就要用文人整理,中国文人们在对著作的定稿和最后润色时起了关键作用。”<sup>③</sup>当时,为了符合中国人的书写习惯,传教士中文报刊上的文章都使用文言文。尽管一些传教士精通中文,但要用文言表达得贴切、雅驯,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仍有相当的困难。正如梁启超所言“故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sup>④</sup>如果要将西方格致之学译成中文,那就更为困难了:“西人尝云‘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与制造等事,几成笑谈。’”<sup>⑤</sup>所以就采用传教士口授文章,由中国文人记录大意,再润色成文的做法,当时许多文章都是传教士的思想加上中国助手的文字合作完成的。所以,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中文报刊几乎都聘用中国文人做中文主笔,例如,发表在《六合丛谈》的《重学浅说》、《西洋原始考》、《西国天学源流》、《华英通商事略》,就是由传教士口授、王韬执笔整理而成的。《万国公报》更是聘请了不少中国人担任中文主笔。

##### 第三,直接为传教士中文报刊撰写稿件

当时有不少中国人为传教士中文报刊写稿。梁发除了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刻印和发行,还为它写文章,尽管梁发只在乡下私塾接受过四年中国旧式教育,但他以“学善者”、“学善居士”的笔名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写过稿。《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传教士中文报刊,也都有中国人撰写的稿件,例如发表在《六合丛谈》上的王韬的《反用强说》、韩应陞的《用强说》、蒋敦复的《海外异人传·该撒》等。在《万国公报》担任中文主笔的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范祎、袁康,更是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沈毓桂268篇,蔡尔康56篇,任廷旭15篇,范祎10篇,袁康17篇,这些还不包括他们与传教士合作的文章。除了这些中文主笔,直接为《万国公报》写稿的中国人还有不少,例如:王韬在《万国公报》发文48篇,郑观应2篇,胡礼坦3篇,宋恕2篇,康有为1篇,孙中山1篇(连载)。<sup>⑥</sup>

① (日)沈国威《〈遐迩贯珍〉解题》,载沈国威、内田庆市、松浦章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② 汤因《中文基督教刊》(手稿),1949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U133-0-33,第33页。

③ (法)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④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6页。

⑤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⑥ 杨代春《〈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8页。

五、传教士中文报刊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中国近代民族报刊提供了物质基础

传教士中文报刊在将西方先进的报业观念、报业模式传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这些在客观上为中国人自己创办近代报刊打下了物质基础。

中国古代邸报采用雕版印刷，线装书样式，并使用木制印刷设备，印刷工艺则采用纯粹的手工操作，即手工线装，这样的技术条件无法印制大张出版物。传教士在创办中文报刊时，将西方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带入中国。《天下新闻》于1828年创刊于马六甲，它不是采用书本形式，而是用铅活字印在散张的纸上，像今天的报纸，所以它是第一份用活字排版、报纸形式的中文报刊。后来，中国境内出版的传教士中文报刊也采用活字排版，例如《遐迩贯珍》，是中国境内第一家使用铅活字的中文报刊。与铅活字同时传入中国的还有石印技术，1838年创刊于广州的《各国消息》，是我国最早使用石印技术的中文报刊。之后，铅印和石印这两种技术同时并存于传教士中文报刊之中。与此同时，印刷业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墨海书馆是伦敦传教会上海传教站的一个出版机构，其前身是巴达维亚印刷所，鸦片战争后迁来上海，迁上海后改名墨海书馆。它引进英国制造的新式印刷机和金属活字，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有铅印设备的出版机构。它还有以牛力拖动的机器印刷设备，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当时一位中国人写了一首诗用以描述此番情景：“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字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sup>①</sup>19世纪80年代以后，印刷设备不再以牛力作为动力，而改为蒸汽机，进一步推动了印刷业的机械化生产。

总之，传教士中文报刊为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是中国人自办近代化报刊的催化剂。在传教士办报活动的刺激下，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报刊对于社会舆论的独特作用，开始投身报界，尝试以报刊作为改革社会的武器。“知识分子无法运用国家权力实现改造国家衰败的命运，认识到报纸宣传舆论、教化民生的作用”<sup>②</sup>，遂开始办报。19世纪7、80年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近代化报刊问世，至“甲午战争前的二十年间，中国人先后自办了约二十家近代化报刊。”<sup>③</sup>戊戌变法时期，国人自办报刊更如雨后春笋，仅1896—1898年间，国人新创办的报刊就达65种。<sup>④</sup>这些报刊，差不多全部以近代化的外报为蓝本，“一切均仿泰西报馆章程办理”，所以它一开始就能以一种符合近代报刊模式的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西方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在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融合后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些理论与实践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国人自办报刊，在随后的岁月里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作者赵晓兰，浙江传媒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

## 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内在精神的解读与创新

——读洪修平教授《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

胡永辉

自汉以后，三教关系是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儒学是否为宗教的问题，历来有所争论。这反映在三教关系的研究上，集中体现于对三教之“教”内涵的如何把握。然而，三教之学及其关系的历史衍变绝不是纯粹地、单一地脱离社会环境的学术形态，相反它是应具体的时代环境而生，并且能反作用于现实社会。从“学”的层面和从“教”的层面都有失片面，只有从内在精神的层面去把握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才能真正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全貌。由此可见，三教之学不仅仅是哲学的三教之学或宗教的三教之学，而是兼顾宗教与哲学的“教化之学”。以佛教为例，侧重于宗教信仰的佛教和侧重于哲学思辨的佛学，始终共存不悖，相辅

① [英] 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译者注。

② 谭泽明《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创新路径》，《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③ 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④ 参见陈玉申《晚清报业史》第三章“维新报业的勃兴”相关内容与统计表格，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